

“总体布局”视域下毛泽东三线建设研究

朱民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 是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 在战略和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中国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三线建设中中国工业布局的思想包括“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以及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等措施, 这场声势浩大并且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总体布局”思想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工业布局; 战略; 三线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3)02-008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下简称“总体布局”)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其内涵、修正其表述的过程。对于“总体布局”的概念,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它定义,一种是从内容构成的角度;另一种是从性质和功能上来把握。笔者认为“总体布局”是指“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出发,依据时代变化和国情发展的要求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的、基本的内部组成方面及相互关系的总体性认识和由此做出的宏观的、多位一体的、战略性工作部署。”^[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已经孕育了“总体布局”的思想。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战略和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中国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这场声势浩大并且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总体布局”思想重要体现。认真回顾毛泽东在三线建设中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总体布局的思想

毛泽东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早在 1940 年,他就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 (P66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观点,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3] (P270)}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在考虑经济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要把国际形势和军事局势考虑进去。他说“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仗来再搬家。从现有的材料看,轻工业工厂的

作者简介: 朱民强,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长,一个厂,至少半个长。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了,这种形势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3]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总是辩证的。他强调“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做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3]毛泽东认为毋庸置疑的理由:“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4](P270-271)在生产力布局调整上,具体来说,在工业布局调整上,毛泽东兼顾科学平衡与合理利用,也就是说:如果只发展沿海,内地就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而且内地的丰富资源也无法利用,沿海的发展也难以继;如果只注重内地,沿海的工业底子就会闲置浪费,而且发展内地工业的资金也将匮乏。尽管后来在发展内地工业时过多地搞了“大三线”,造成了一些新的闲置和浪费,但从布局 and 战略上看,以发展内地工业为主,兼顾发展沿海工业,无疑是合理的选择。

二、“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1963年初起,国家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1964年二三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工交和全国农业两个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指导方针的同时,也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国家计委于同年4月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将基本任务概括为三方面:首先是大力发展农业,强化基础,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其次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力争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最后是在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的同时,发展基础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初步设想》,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

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

上个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中苏关系恶化,1962年,苏联在中国伊犁地区制造摩擦,煽动部分中国居民外逃。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向中苏边境大量派兵,将原有的只有10个师20万人的战略部署大大增加到了54个师接近100万人。同时,将一部分战略导弹也调整了目标指向,对准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的军事设施。1969年,我国与苏联发生了珍宝岛保卫战,由此双方各自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美国与我国周边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反华条约,而且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企图对中国形成新月牙型包围。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并且使战争逐步升级,1965年3月,美国在越南登陆并把战火烧到了中越边界,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印度在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国家的支持下,不断与中国发生冲突,使得中印边境的局势也很紧张。因为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以致在1962年中印两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边界战争。当下,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来凑热闹。他们多次派遣武装特务部队偷袭和骚扰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试图在我东南建立“游击走廊”,并且企图实施“反攻大陆”的作战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表示,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在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前夕,毛泽东听取有关“三五”计划的汇报,讲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5]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十分赞同,认为这是回答“到底基础工业放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屁股必须要坐得扎实,坐得稳。”“基础坐得稳,站得住,两个拳头才能伸缩自如。”^[6]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制定‘三五’计划,一定要切实考虑到全国工业不平衡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特别要突出加强三线建设,时刻做好防备敌人的入侵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加强战备。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备战,明确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毛泽东还指出要搞攀枝花钢铁厂和酒泉钢铁厂,他坚信攀枝花和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意义重大,一定要抓好落实。通过二者的比较,酒泉地理位置靠近苏联、蒙古,从战略布局方面不比攀枝花安全。鉴于此,后来建设过程中酒泉基地就被放在了第二位,攀枝花基地建设就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第一要务、重中之重。毛泽东指出“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7]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三线建设的部署。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做了批示,并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现在工厂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分为二,抓紧时间将工厂向内地转移;同时,各省都要高度重视,做好搬家工作,迅速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最后做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了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三、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

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有关部

门迅速从三个方面对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将一线的全国独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须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三线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了我国的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个地区。按我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第一线应为沿海地区;中部为第二线;第三线是后方。在地理位置上,三线后方又分为两块: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或全部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四省区全部及大部以及鄂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所谓的三线建设,多数情况下是指大西北和大西南后方建设。事实上,三线建设又由大三线和小三线两部分组成,其中大三线是指西南、西北三线,小三线是指中部及沿海省区(一、二线)的腹地。周恩来这样论述三线建设“除了攀枝花(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的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于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8][P197]}因此,从地域来说,三线建设覆盖了全国各地,从行业来说,它不仅包括国防工业,也包括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在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将西南、西北内地的战备和长远建设,与改变内地和沿海的工业布局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毛泽东认为敌人来与不来都有可能,来了,我们就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之;不来的话,我们就继续搞长远建设,“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毛泽东设想,三线是一个单独后方阵地,一、二线是一个前方生产阵地,以一、二线的大生产来支援三线的大的长远的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生产支援内地工业发展,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水平。对于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他们的看法也是不无道理,本来我们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周恩来也具体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长期规划,要备

战与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照顾备战,但长期总不能取消,要互相结合。你不打,我东西多生产一点,总是有用的。”^{[9] P428}毛泽东设想,在全国搞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大约要经过15年的时间,3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四、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

196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对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铁路、矿山、冶金和国防建设项目进行选点考察,初步选定了一批厂址和铁路线路,拟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

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中大型项目300多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肥、森林、建材、铁道、交通、民航、纺织、轻工、水利以及农业、林业、商业、邮电、广播、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以及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昆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等为重点。

从1965年初起,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质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各省、区、市也加快做出三线建设的安排。1964年10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分别提出了《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以及将广州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做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五、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

1965年国家计划(包括中央和地方)安排用

于三线的投资占基建投资的近1/3;1966年计划安排用于大小三线及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占到基建总投资的一半。为使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力,还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措施。1965年8月召开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立足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随后,大规模搬迁和建设工作即迅速展开。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启动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启动。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

在三线建设陆续展开的同时,以备战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计划工作的不满,1965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余秋里等五人组成的“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小计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的“三五”计划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三五”计划问题时,明确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并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三线要互相促进”,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等重要思想。毛泽东提出“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这是毛泽东鉴于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思想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一方面从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些,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严、太苛刻,首先是关心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其次是准备打仗,第三是应对灾荒,制订计划要同时充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关注人民生活 and 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根据毛泽东的目标要求,国家计委将原定的建设资金由1080亿元降到850个亿,缩减了230个亿,同时,在三线建设中注重不与民争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三线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山”、“散”、“洞”的方针。该方针的制定既与战略要求相适应,又与防止占用大量耕地、浪费资源,避免与民争利息息息相关。毛泽东还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9]此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成为从执行三线建设开始的较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

实践证明,三线建设“这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移’”,“‘三线’建设对于

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当年所说的战备意义”。^{[10] (P32~33)} 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工、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没有当初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都显著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促进了大三线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1] (P206)} 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但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合理的畸形布局,奠定了国防经济建设雄厚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了对战争打击的承受力和支持侵略战争的能力。但是,由于对战争做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视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了不少浪费。

[参考文献]

- [1]张荣华,原丽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研究论纲[J].济南:理论学刊,2011,(2).
-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讲话[R].北京:中南海,1964.
- [6]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R].北京:中南海,1964.
- [7]党的文献[J].1996,(3).
- [8]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
- [11]谷牧.谷牧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The Research of Mao Zedong's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General Layout"

ZHU Min - qiang

(School of Marxist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in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ondition of China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strategy, Mao Zedong fully considered the layout of China's industry development. Thus the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started in 1960s. The ideas included the shift of the strategic focus of the "third five-year" plan, the strategic plan of the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and the adjustment about national economy layout. This superb and far-reaching movement was the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general layout" idea.

Key words: industrial layout; strategy;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李 官)